

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理论

——纪念“和平共处”理论问世50周年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和平共处作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是周恩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 伴随着新中国外交走向世界逐步架构起来的。说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理论, 其一是它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基本趋势; 其二是它成就了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业绩——中美关系的新突破——揭开了和平发展新时代的序幕; 其三是它涵盖和统摄着当今世界一切关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的理论, 它将深远影响着21世纪乃至人类的未来。

关键词: 和平共处; 周恩来; 理论; 业绩; 未来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4)05-0561-06

和平共处作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是周恩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 伴随着新中国的外交走向世界, 逐步架构起来的。这大概经历了: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构建阶段。主要表现在建国初,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制订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上。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的态度的外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与之谈判, 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 周恩来遵循毛泽东确立的基本原则, “高度概括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6条方针, 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1], 和平共处是其中的基本内容。其实践的重要标志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和缔结, 抗美援朝相关的外交斗争, 这为周恩来构建和平共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阶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 在解决中印、中缅关系时首次提出的, 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共同首倡的。周恩来从不贪功,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创权, 他总是说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外交思想或者是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这虽是事实, 但也丝毫无损周恩来的首创之功。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 毛泽东还同时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 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可以说, 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直接源头。其后, 毛泽东、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中, 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精神:“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 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 发展和巩固”中苏关系。这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的内容, 在这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具雏形。而这

收稿日期: 2004-06-02

作者简介: 汪浩(1942-), 男, 江苏涟水人, 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研究会会长, 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副会长,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哲学、中共党史研究。

个条约的主要撰稿人正是周恩来。

1953年底,印度代表团来华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商谈。12月31日,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次提出。

从地区性国家关系原则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1954年4—7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外交代表团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现在日内瓦国际外交舞台上。周恩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沉着、机敏、巧妙,有理、有利、有节,坚持和平、协商、和解,使傲慢的杜勒斯和不愿和解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和出丑的境地,“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使光彩夺目的周恩来与充满朝气和活力、自信而又彬彬有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走进了世界外交大舞台。日内瓦会议的重大国际意义在于:开创了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它揭示了国家不论大小、要在国际大家庭中实现和平共处,通过谈判、平等协商是唯一的途径和最有效的实现形式。而这一重要的经验正是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通过团结与会各国外交使团,其中包括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外交使团、工作人员斗争得来的。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和平共处理论由地区性国家关系原则走向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功实践。周恩来在这一实践活动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实施途径和实现形式——平等协商,创造性地丰富了这一崭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为此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为周恩来在以后的外交活动中运用这一锐利武器,纵横捭阖、游刃于国际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成就登峰造极的外交业绩,开辟了途径。

亚非万隆会议既是新中国外交走向世界,也是周恩来和平共处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周恩来冷静、沉着,采取克制、忍耐、回避、不争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等巧妙策略,并伴之以兄弟般的平等和坦诚,在会议将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一言九鼎以“求同存异”这四个字,一下子抓住了会议的主题,一下子击中了会议破坏者的要害,也一下子使那些会议观望者猛醒,从而团结了会议的大多数。对那些别有用心心的诬蔑和攻击,周恩来以退为进,不失分寸地说:本来我们可以提出来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

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2]。同时他又以通情达理的灵活态度对待有关会议成败的具体问题:有的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周恩来就提出用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来替代。他强调“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3]。

在周恩来大义凛然、通情达理、豁达大度、平等坦诚的努力与感召下,万隆会议通过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相处十项原则”,取得圆满成功。正如当时的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那样:“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确实确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出席万隆会议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5]

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大外交家风范的一次集中、全面的展示,是周恩来和平共处理论第一次全面、成功的示范。周恩来在这一伟大实践活动中,再一次使和平共处这一伟大理论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值得重视的是,继日内瓦会议提出平等协商这一和平共处实施途径和形式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实施和平共处基本方针和基本方法——求同存异。这样,和平共处理论与实践之间最重要的中介环节,即方法论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万隆会议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更高层次上,把和平共处这一伟大理论提升到系统与科学的新阶段。

和平共处适用范围的拓展与延伸,是这一理论迈向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都对和平共处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其着眼点都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问题。1956年,波匈事件后,周恩来根据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变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更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基本思想。他在当年11月1日由他审阅的中国政府就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所发表的声明中着重强调了这一思想。后来,在解决中苏关系问题时,又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延伸到处理兄弟党关系问题上,强调一切已经取得或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以平等互利、合作交流、互相学

习和借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基本原则。实践证明, 尽管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 但只要违背和平共处的原则, 国家关系就会恶化, 甚至导致战争。就是在同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之间也是如此。20世纪60—70年代, 中法、中加关系, 中日、中美关系的变化, 以及中苏和社会主义集团之间、国家关系与兄弟党关系的变化, 充分证明了周恩来这一重要思想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在联系的理论阐述, 是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理论建树的重要内容, 也是和平共处从“原则”走向“理论”的重要标志。在万隆会议上, 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在联系: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侵犯,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 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 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 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 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2]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四项的精髓是独立自主, 最后一项和平共处是核心; 前四项是前提和手段, 最后一项才是目的和落脚点; 五项原则的本质就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在这里, 周恩来阐明了和平共处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而且是国际安全的重要原则。之后, 周恩来在出访时, 在接待外宾时, 又多次讲和平共处的问题, 归纳起来, 有如下要点: 1、和平共处是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 是我们的基本政策。2、和平共处的目的就是求得人类繁荣, 经济发展。和平共处就是彼此不使用武力, 互通有无, 共荣共存。3、各个国家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 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都不能强加, 不能包办代替, 革命和反革命都不能输入和输出。和平共处意味着和平竞赛。4、和平共处不是不要斗争, 乞求和平共处只能招来侵略和欺辱。通过必要的斗争甚至武力的较量迫使破坏和平共处者坐到谈判桌旁。5、有平等才有和平共处, 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不能和平共处。6、和平共处可以等待, 可以“民间先行, 以民促官, 长期积累, 水到渠成”。7、和平共处要以诚信为本, “言

必行, 行必果”。

和平共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更是他一生外交实践所凝聚的理论丰碑。在他逝世前夕, 依据和平共处原则精神, 我国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今天, 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反映在许多国际文献中, 甚至成为一切公共关系的准则, 反映在不同层次的社会集团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值得注意的是, 周恩来在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 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20世纪50年代那种对抗式外交的高起点和那种包容整个世界的超凡脱俗的大气魄, 使我们今天这些后来人回顾这段历史时, 为他那种跨越时代的雄才大略所深深的震撼和感动。1954年10月11日, 周恩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 “中国和印度虽然国家体制、社会制度不同, 但两国知道彼此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倡导五项原则, 就是大家知道的……我们认为, 这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 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 甚至全世界各国。我想, 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他还指出: “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 我们也欢迎, 我们并不排斥美国。”^[3]事实是18年和25年后, 中日、中美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 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初, 就把它看成是国际关系的普遍性原则, 其目光的深邃, 战略思想之高远, 理论思维之超前, 就是在50年后的今天, 仍令人惊叹不已!

从新中国成立到周恩来逝世, 这短短的20多年间, 周恩来从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 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 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架构了20世纪关于国际关系的最重大理论——和平共处理论。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 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 关于国家主权、民族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关于国家、民族的观念就已经产生, 而且在其后的国际法中也有所体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帝国主义列强到处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残酷现实面前, 国际法不过是一纸空文。十月革命后, 列宁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 但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比较弱小, 帝国主义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如何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 列宁的和平共处只能是一厢情愿。二战后, 随着雅尔塔体制的构建, 世界两大政治集团

形成了暂时的力量均势,加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要独立、要民主、要平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不仅有了相对均势下生长的土壤,而且到亚非万隆会议前后,已成为一股社会潮流。无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素质的角度,中国总理周恩来作为这一潮流的代表者和发言人,都是最合适不过的。20世纪60—70年代,以高新技术为中心内容的第三次浪潮导致整个世界开始进入新的转型时期,世界在呼唤新的理论,世界在呼唤政治经济的新秩序,这就是和平共处这一重大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在亚洲,由周恩来等人首倡的背景;这也是和平共处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准则和理论,为什么比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的甚至在国际法中有所反映的那些孤立的条款,具有无法比拟的强大威力的根本原因。

二

回眸20世纪,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在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方面的重大贡献,那就是:周恩来首倡的和平共处理论开创了一个和平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周恩来在和平共处理论的架构和实践过程中,成就了新中国外交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周恩来研究资深专家李琦同志关于周恩来外交业绩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回顾历史,可以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新中国是通过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走向世界的,而世界也是透过周恩来的形象开始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的。”^[1]这个概括是很准确的。但这一概括是以中国作为观察的立足点的。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立足点扩大到整个世界,把我们的视觉跨度向人类历史进程延伸,我们就会觉得不能以这样的概括为满足。因为周恩来的外交业绩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成果,他的外交业绩将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周恩来成就了20世纪最辉煌的外交业绩,这一业绩是多方面的,但最具代表性,既是周恩来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业绩,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如果说和平共处理论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那么,周恩来、尼克松1972年天安门广场那富有历史象征性意义的握手,就是这一新时代来临的伟大标志。正如尼克松所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三次新旧秩序的调整

与构建:一战后,巴黎和会与列宁对德和约,构建了二战前世界的基本秩序;二战后的基本秩序是由开罗宣言、雅尔塔大国首脑会议决定的,雅尔塔体制(两极世界格局)主宰世界40多年;1979年中美建交,1990年代初,东欧演变,苏联解体,两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以多极化为特点,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的时代潮流,正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劲的态势向前推进。而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新突破,开启了这一时代潮流向前推进的闸门。

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不是少数领袖人物的心血来潮,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浪潮而导致的世界范围的巨大变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当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来临之际,当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为了致力于国内发展经济,调整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积极准备从越南等地撤军;而当时作为世界另一极的苏联正好相反,它没有把握住新技术革命这一世界潮流,着力推行勃涅日列夫主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中美关系的新突破,就是在这种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不仅是周恩来登峰造极的外交业绩,而且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它不仅使二战以来两极世界关于对抗、关于遏制那种集团政治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理念走向终结,而且还对后来人在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多极化趋势为特点,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所需要的关于世界安全和国际外交的新思维和新理念具有启迪作用。周恩来不仅以中美关系的新突破为代表的辉煌的外交业绩如高山般令人仰止,而且还以他创造这些伟大业绩中所蕴含的崇高的精神理念永远给我们以启迪。

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是周恩来和平共处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周恩来外交理念的基本内涵。建国初,周恩来就提出了“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友好合作”、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竞赛”的新观念,就已经洞悉了“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2]。1973年6月周恩来会见戴维·洛克菲勒时提出,必须寻找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合适方法,并指出像中美联合公报

那种求同存异的方法是可取的。与周恩来同时代的外交家、政治家,当时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关于“和平”、“合作”、关于“共同发展”这一外交理念的重大意义,现在,当新经济与全球化成为社会潮流,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求区域性、国际间各种形式的平等互利、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周恩来的这种预见性、深刻性、超前性所折服,为他的高瞻远瞩而惊叹!

共荣、共存、共同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实践以和平共处为中心内容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建立国际力量均势的意识,在酝酿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初阶段,已经开始形成新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国际力量均势关系上,力量平衡上,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多边关系上。他把“友好合作”与“持久和平”联系起来,作为中国外交追求的基本目标。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新中国作为世界安全新的稳定因素融进了国际大家庭。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增强了世界局势中的稳定因素。在这世界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周恩来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6]。周恩来逝世不久,尼克松来华时对邓颖超说,没有必要为周恩来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明证”^[6]。

“和”、“合”、“共”——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共同发展——周恩来外交理念中这一核心内容,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哲学。太极图——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中就出现了它的雏形——阴阳鱼和合图式,便是后世关于这一古老哲学结构模式的形象概括。《道德经》说“和曰常”,“和”是客观规律。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7]。可以说,这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哲学理念的洞悉骨髓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和合”理念的熏陶下,我国古代就孕育了关于一切公共关系——人与人、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甚至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可以说是儒家

提出的关于公共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的准则;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孔子讲“和而不同”,可以说是和平共处理论的最早源头;有人把“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说成是世界外交起源于中国商初的明证;至于《周易》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说世界的发展变化,万事万物各得其位,保持合作与和谐,就能顺利发展,这简直就是现代“共生说”——由生物共生到人类共生、万事万物共生——的基本观点。《周易》可以说是从哲学高度探讨可持续发展,其中也包括外交理念的最早典籍。这就是和平共处理念的深远渊源。

邓小平同志最早指出和平共处外交理论的重大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都解决不了问题;和平共处……适用于全世界,它能够为社会不同制度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服务,是最经得住考验的。”邓小平据此提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还在周恩来关于和平、合作、发展这些理念的基础上,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为构建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新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

跨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化、知识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以国家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坚持多边合作、公平竞争、和平发展为基本特征。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指出:“当今世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孤立、自足的国家经济体系,现在必须承认,我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论全球化时呼吁“把地球看作一个大家庭”^[8]。加拿大外长与挪威外交大臣联合撰文指出,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一个国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完成,他们呼吁建立一种合乎人道的国际秩序,这种新秩序“需要人们在直接解决影响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和权利的问题上达成新的广泛的共识”^[9]。“9·11”事件,更使许多政治家恍然大悟:大国包揽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靠各国合作

应对。”^[10]“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1]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12]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的全面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理论及其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必将在今后的中国和世界产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重大影响。20世纪,是一个动荡、激烈变化的世纪,也是产生思想和伟人的世纪。我们说,和平共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理论,其一是说它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基本趋势;其二是说它成就了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业绩——中美关系的新突破——揭开了和平发展新时代的序幕;其三是说它涵盖和统摄着当今世界一切关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的理论,它具有强大的历史贯串力和穿透力,它将影响着21世纪乃至人类的

整个未来。时代在呼唤和平发展,时代在呼唤合作共处,时代在呼唤和合精神!当人们迎着新经济与全球化浪潮展望21世纪的时候,禁不住惊诧地发现,时代在呼唤周恩来!周恩来是那些站在时代的高峰,掬取人类进步历史潮流中智慧的浪花,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罕见的历史巨人! <

参考文献:

- [1] 裴坚章.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1.
- [2] 周恩来选集: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18; 154; 150; 151; 51.
- [3]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127; 129; 91-92.
- [4] [美] 鲍大可. 周恩来在万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62.
- [5] 曹应旺. 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188.
- [6] [美] 尼克松. 领导者[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341; 363.
- [7] 钱穆. 中国文化精神[M]. 台北: 三民书局, 1971. 51.
- [8] 世界迅速向全球主义目标迈进[N]. 参考消息, 1998 11-23.
- [9] 建立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国际秩序[N]. 参考消息, 1998 10 24.
- [10] 江泽民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N]. 新华日报, 2002 4 11.
- [11]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30 31.
- [12] 胡锦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 光明日报, 2004 02 25.

The Greatest Diplomacy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ory

WANG Hao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wadays in the world, and going with Chinese diplomacy moving toward the globalization,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ory was formed gradually in the fif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asons why we call it the greatest theory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First, the theory reveals the essence and basic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the theory has made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for the 20th century—new breakthrough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which uncloses the new age prelud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Last, the theory contains all theorie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and will have a deep impact on the tim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so far as to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

Key words: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ory; Zhou En lai; theory; achievement; future

责任编辑: 张 超